

重大疫情视阈下大学生社会认同教育研究

——基于疫情初期网络大数据及问卷调查分析

周瑞春 金成 陆启义 曹俊康*

【摘要】随着社会变革深化，大学生群体的思想动态和社会情绪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关切，在面对重大公共事件时对大学生开展社会认同教育十分必要且意义重大。本文以新冠肺炎重大突发疫情为例，通过对疫情初期网络大数据整理、参与式观察、调查问卷等形式深入考察，认为在网络媒介时代，大学生社会认同各阶段的推进都受到网络议程设置的重要影响，应充分利用媒介技术推进“融媒介”教育体系建设。与此同时，在重大突发疫情特殊时期，还应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构建基于兴趣爱好的网络趣缘共同体，引导大学生群体凝聚认同共识、分享共通情感、缓解心理压力，推进大学生健康人格发展下的成长成熟。

【关键词】重大疫情；大学生；社会认同；议程设置；融媒介

DOI:10.16775/j.cnki.10-1285/d.2022.11.001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是以“人”为主体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社会关系活动，个体在利用媒介工具进行信息传递、劳动生产、社会交往时，形成相互依赖、相互认同的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文化共同体等人类社会共同体基本类型。作为自然属性的个体，在开展社会认同的过程中融入群体、构建共同体，有助于拓展自身的社会属性。由此可见，社会认同既是个体实现自我完善的必要条件，也是维护社会共同体稳定发展的保障。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湖北省武汉市被首次发现，并因其可传染性迅速扩散至全国，各省区市相继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新冠肺炎”成为全国性的重大突发疫情。随着疫情加剧，各类媒体围绕疫情动态以网络空间为主要场域开展24小时轮播报道，巨量信息

* 周瑞春，哲学博士，无锡太湖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金成（通讯作者），管理学博士，无锡太湖学院校长、研究员；陆启义，无锡太湖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曹俊康，无锡太湖学院信息中心助理实验师。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思政专项“网络亚文化视域下大学生社会认同研究”（2022SJSZ0423）阶段性成果。

的无序涌现，给公众正确认知疫情动态、强化社会认同、提高全面抗疫共同体合力等带来了诸多困扰。疫情暴发初期，大学生群体适逢春节假期返乡，成为全民抗疫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疫情期间国家政策、政府举措、所在地基层抗疫工作的社会认同，直接影响到抗疫全局的高效有序推进。与此同时，对于中国传统家庭结构而言，大学生个体是极为重要的家庭社会成员，尤其是在农村社会，“大学生”一词本身就是知识权威的符号象征，在新冠肺炎疫情家庭单元防控话语体系中，占有重要的知识话语地位，其群体性社会认同的建构甚至关系到特殊时期社会整体安全稳定。综上可见，面对新冠肺炎重大疫情，加强对大学生群体社会认同的教育研究就变得十分紧迫且意义重大。

二、社会认同理论阐释及其研究设想

英国社会心理学家亨利·塔菲尔（Henri Tajfel）在考察群体行为时，最早正式提出了“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理论，该理论随后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扩充，并在社会实践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认可和应用。塔菲尔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①。塔菲尔认为，社会认同的心理进路可以分为社会分类（social-categorization）、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积极区分（positive distinctiveness）三个基本阶段^②。简言之，社会分类是指个体将人们区分为内群体（in-group）和外群体（out-group），将自身初步归入某一社群，认为自己拥有该社会群体成员具备的普遍特征；社会比较是将自身认同的社群与其他社群进行对比，着重比较群体性的优劣、地位和声誉；积极区分是进行人际和群际行为区分，在自尊和自我激励动机下进入行为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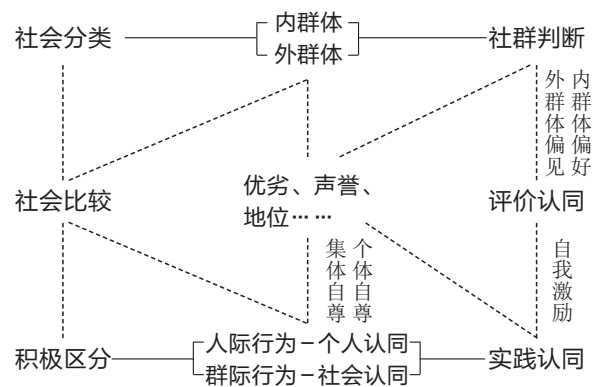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认同各阶段心理进路

① 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3期。
 ② Henri Tajfel,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82 (1) .

从图1社会认同心理进路来看,大学生社会认同教育包含着两个基本任务面向:第一,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自我、进行社会群体分类,培育其发挥自身社会角色功能的基本素养和能力,实现个体性自我认同;第二,提高大学生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主观能动性,促使其对国家政府、社会群体的认同和接纳,培育其法律、道德、伦理素养,实现群体性社会认同。社会认同教育两个基本任务的推进是相互交杂、协同进行的,从整体上来看都要遵循个体社会认同的基本心理进路。以新冠肺炎重大疫情为例,主要应从三个方面探索教育引导实践路径:第一,引导大学生通过社会分类,对特定社会背景下自身所处群体进行基本判断,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第二,引导大学生开展内群体和外群体的社会比较,形成对内群体的偏好共识,提高个体自尊与集体自尊;第三,引导大学生基于自尊、自我激励动机,对人际行为(某个群体成员之间)与群际行为(各个群体之间)进行积极区分实践,深化大学生全民抗疫共同体的社会认同。

事实上,由于个体社会角色的多样性,其在不同的“社会布景”(setting)^①中常分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具备不同的群体成员身份,故而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划分在实际操作中具有很强的“相对性”。这种“相对性”是一种社会角色定位的“相对”,客观上使得基于分类的社会认同得以可能。与此同时,由于个体基于信息获取、整理编译、自我判断的认知能力差异和局限,“相对性”也给个体自我社会分类增加了难度。随着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第二媒介时代”^②的到来,媒介从一种工具性“客体”向目的性“主体”转变,直接影响着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全过程,网络媒介信息传播的无序性、偏差性和符号化的特点,更给个体开展社会认同造成极大困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信息流瀑”“信息茧房”“群体极化”等网络社会现象凸显,客观上使得大学生网络媒介时代的社会认同过程阻碍重重。综上,本文认为在新冠肺炎重大突发疫情大背景下,应正视疫情期间媒介信息传播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索大学生特殊时期社会认同教育引导的应对策略。为此,本文以网络空间为重大疫情田野考察主要场域,通过网络媒介大数据采集、参与式观察、问卷调查等形式深入探讨重大突发事件下大学生社会认同教育引导的有效路径。

三、大学生社会认同的基本样态及其存在的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国各省区市相继出台了自我隔离、自我防控政策,客观上使得“足不出户”的大学生们更多地依赖于网络媒介来获取各类疫情动态信息,其认知外部世界的

① [美] 欧文·戈夫曼:《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宋立宏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页。

② [美] 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信息来源受到网络媒介的直接影响。实际上,大学生认识社会、了解社会、开展社会分类和自我身份建构的全过程客观上都是在网络“议程设置”的主导下进行的。“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思想源于美国社会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他在考察公众舆论时认为,人的成长成熟表明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自我认知、群体认同是进化的过程,人们通过公众舆论“逐渐在他的脑海中为自己制作一幅视线所不及的那个世界的可靠图像”,这些对人类群体或者以群体名义行事的个人产生影响的图像就是由新闻媒介垄断的“舆论”。^①此后,这一思想被美国传播学者马克斯韦尔·麦克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所吸收并正式提出“议程设置”理论,该理论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发现,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媒介报道活动高度正相关,即媒介话语主导着公众重要话题的生产及其认知判断。^②由此可见,对于新冠肺炎重大疫情来说,网络议程设置对大学生在自我脑海中建构“世界的可靠图像”、推进社会认同发挥着重要影响。为了全面掌握重大疫情下大学生社会认同的总体情况及其可能存在的问题,本文一方面对疫情网络大数据进行采集整理,另一方面以W高校大学生群体为样本池开展问卷调查,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整理对比和深入分析。

(一)以网络议程设置作为社会认知的基本节奏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2020年1月30日《大数据揭示:这半个月中国人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的》数据报告,以100数值为公众关注度最高值来比照,1月20日前公众关注度一直低于90,23号为最高峰96.95,25号为次高峰96.24,25号后起伏震荡,国家信息中心由此认为疫情公众关注度可分为“普通关注期”(16—19日)、“担忧骤增期”(20—23日)、“众志成城期”(24日开始)。^③为加强数据比照分析,笔者在W高校官方认证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新冠肺炎(NCP)疫情大学生社会心态及感受调查问卷》,该公众号为微信服务号,仅用于在读学生绑定学号进行在线学费缴纳通道,粉丝用户绝大部分为在读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样本意义,问卷发出24小时内共计收回有效答卷124份。

表1“每天阅读观看疫情时间”,第17题(单选)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1小时以下	44	35.48%
1—2小时	62	50.00%
2—3小时	9	7.26%
3—4小时	5	4.03%
5小时以上	4	3.23%

① [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② Maxwell E.McCombs, Donald L.Shaw,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72(2).

③ 《大数据揭示:这半个月中国人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的》,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687817, 访问日期:2022年7月31日。

表2 “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视疫情”，第30题(单选)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2019年12月得知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	37	29.84%
1月20日得知“人传人”	61	49.19%
1月23日得知武汉封城	19	15.32%
1月25日得知中央召开疫情防控会议	2	1.61%
本地出现确诊病例	2	1.61%
当地干部宣传或采取封村、封区、封路措施	2	1.61%
至今无所谓	1	0.81%

由表1可见，在“您每天阅读观看疫情时间”（第17题，单选）中，每天关注时间1小时以上的共计80人（64.52%），其中2小时以上的有18人（14.52%），充分说明大学生群体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主动认知关注度较高。在表2中，以1月20日“人传人”、1月23日“武汉封城”、1月25日“中央召开疫情防控会议”为重要时间节点，大学生群体对疫情的重视度有明显的变化，这一阶段性变化与网络议程设置“普通关注期”“担忧骤增期”“众志成城期”三个阶段高度一致，再次印证大学生群体开展社会认同的基本节奏受到网络议程设置的重要影响，大学生作为整个社会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面对重大突发疫情时，并未游离于其他社群之外，总体上呈现认知节奏的一致性。

综上，这一基本样态对于大学生社会认同总体进路而言，既保证了大学生群体不会过于“出格”，但也使得大学生话语建构的主动性不够，容易被网络议程“带节奏”，受到不良网络议程言论的误导。比如，在“您得到的所有疫情消息中有多少被证明是误传或谣传”（第20题，单选）中，收到过2条以下50人（40.32%），3条及以上74人（59.68%）；在“您曾相信过那些谣言吗”（第21题，单选），“全都相信过”2人（1.61%），“有一些信过”70人（56.45%），“从来不信”52人（41.94%）。实际上，大学生群体由于人生阅历相对较少、容易情绪化、易被煽动等原因，也是重大疫情期间网络谣言的主要目标接收群体之一，这些对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认同观、开展准确的社会分类、社会比较也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以“污名化群体”作为社会认同的主要类型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凯·杜尔琦（Kay Deaux）认为，社会认同可以分为“民族和宗教认同”“政治认同”“职业与爱好”“人际关系”“污名化群体”五种类型。^①社会学领域对于“污名”（stigma）的研究由来已久，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对“污名”的经典阐释最早获得普遍认可。戈夫曼认为，“污名”的出现常表现为描述“不受欢迎”社会类型者“会让人感到丢脸”的某种特征，但真正需要的则是“用语言揭示各种关系”，实际上“污名”是作为一种话语符号系统进行社会分类的工具，其结果是形成“蒙受污名者”和“常人”

^① 付义荣、葛燕红：《社会语言学视野中的社会认同理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各自群体成员而言,则是一种社会分类、社会比较下的社会认同过程。^①调查发现,大学生主要以群体“污名化”为导向进行社会分类和比较,完成内群体认同和外群体区隔。比如,在普通关注期,在病毒来自野生动物的传言下,针对“吃蝙蝠”者、“吃野味”者的群体面相“污名”形成,大学生群体对这一“污名”群体进行生态伦理批判,由此形成了不吃野味、恪守生态伦理规范的“内群体”,相对于与吃蝙蝠、引发病毒传播的“外群体”形成社会分类区隔。又如,随着疫情加剧,公众对武汉市卫健委初期防控不力的质疑声音增大,而武汉市红十字会因发放救援物资不力“口罩门”事件及相关网络谣言的传播,则进一步使得红十字会网络“人设”^②公益形象受损,作为组织面相的“污名”由此生成,此时大学生群体在对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社会公益组织的网络信任度变化中,强化自身社会责任心、道德感,实现自身对于社会公序良德的社会认同。由此可见,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通过“污名化群体”来自我分类,则是其最为主要的社会认同类型。

综上,这一基本样态使得大学生在重大突发疫情中能够快速建立自身角色定位,在社会分类和比较中确立自身社群归属、道德立场、价值选择,然而,“污名化群体”的社会认同类型最大的弊端在于容易造成“蒙受污名者”群体和“常人”群体的区隔、分化。对于新冠肺炎疫情而言,“武汉人”原本是受病毒侵害的受害者,但是由于疫情初期针对“吃蝙蝠”(感染病毒)武汉人、“逃离武汉”(传播病毒)武汉人的网络谣言“污名”化,使得武汉人在祖国同胞共同体层面上被疏离,成为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甚至可能给现实生活中“武汉人”与“非武汉人”埋下对抗和冲突的隐患、增加社会群体之间的不信任、减少存量社会资本。由此可见,大学生群体在“污名化群体”类型下的社会认同之路,存在其固有的内在弊端,必须加以规范管理和教育引导。

(三)以自我“积极区分”作为社会认同的重要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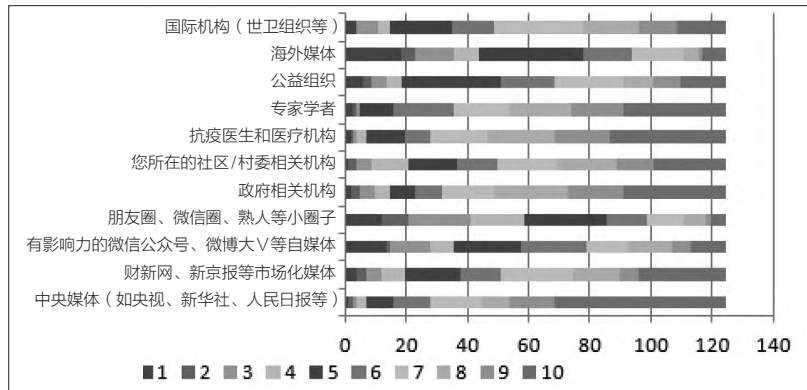
调查发现,大学生群体通过主动学习病毒防控知识、理解政府防控管理举措、积极区分网络谣言等形式,建立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高度信任,提升对国家抗疫必胜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荣誉感,实现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根据调查统计,在“你是否曾转发过网络谣言”(第22题,单选),选择“转发过几条”的有12人(9.68%),选择“从来不转发”的有112人(90.32%);在“对于疫情报道媒体您更相信(媒体)”(第26题,单选)中,选择“中央媒体”76人(61.29%),政府疫情发布会37人(29.84%),而“自媒体”6人(4.84%)、“海外信息”3人(2.42%)、地方媒体2人(1.61%);在“遇到有所怀疑的疫情信息如何处理”(第27题,单选)时,选择“网上自行搜索和发帖求证”“查询中央媒体”“查询地方政府网站”的共计85人

^① [美] 欧文·戈夫曼:《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宋立宏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5页。

^② 周瑞春:《网络“人设”中的自我认同及其伦理之维》,《天府新论》2020年第1期。

(68.55%)，“翻墙看外媒”5人(4.03%)；在“您对于下面这些机构群体的信任程度”(第33题，10分制矩阵量表题)中，对“中央媒体”(平均值8.17)、“抗疫医生和医疗机构”(平均值7.85)、“政府相关机构”(平均值7.58)的信任值明显较高。

表3 “机构/群体信任程度”，第33题(矩阵量表)



除此之外，大学生群体也表现出较高的社会责任感，有着较强的公民角色担当。比如，在“我非常愿意遵从疫情防治措施并乐意贡献自己的力量”(第9题，量表题)中，笔者以“李克特量表”1-5分代表“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进行量值调查，从特征数据来看，最小值2分1人，最大值5分89人，平均值4.64分，标准差0.64，方差0.41，量值分布较为集中。这一调查统计说明，大学生群体绝大多数人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愿意为抗击疫情作出更多贡献。总的来看，在疫情中，绝大多数大学生都能主动开展自我“积极区分”，并以此作为社会认同的重要标志。

综上，通过自我积极区开展社会认同的基本样态，使得大学生的自主性、独立性得以彰显，而基于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也使得大学生群体能够很好地排除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诱导风险。比如，第26题“对于疫情报道媒体您更相信(媒体)”选择“海外信息”仅3人(2.42%)，第27题“遇到所怀疑的疫情信息如何处理”选择“翻墙看外媒”仅5人(4.03%)。这些说明目前我国对大学生自我意识的培育发挥了很好的良性循环作用，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大学生对于自我过度的关注也可能会造成“人际认同”的相对缺失。比如，在第14题“关于疫情你主要的信息来源”中选择“周围的人”52人(41.94%)、“微信(包括微信好友、微信群、朋友圈)”69人(55.65%)，应该说比例相当高，然而在第33题“在疫情中对机构或群体的信任度”(10分制矩阵量表题)中，对“朋友圈、微信群、熟人等小圈子”信任度的平均值仅4.62分。这也进一步说明，大学生群体过度自我意识下的“积极区分”对于人际认同可能具有的反向作用。实际上，如果个体过分热衷自己的群体，认为它比其他群体好，并且从寻求“积极区分”的自尊中体会群体间的差异，就容易引起群体间偏见、群体间冲突和敌意。

四、推进大学生社会认同融媒介教育路径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赫伯特·凯尔曼(Herbert C.Kelmen)在考察个体社会认同过程中的态度变化后认为,社会认同在本质上是个体由于想与他人或群体建立和维系一种令人满意的关系,而接受其影响时所产生的行为。^①在这过程中,个体借助信息媒介对他人或群体开展认知判断、分类区隔,而其认同的具体行为也是通过各类信息媒介的反馈实践。新冠肺炎疫情大数据及问卷调查也充分表明,在“社会分类”“社会比较”“积极区分”各个环节,大学生社会认同全过程都受到以网络媒介信息传播的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在“融媒介”技术赋权之下开展的。这种“融媒介”是依托于数字通信传播技术,通过音频、视频、文字、图像等多种信息形式,结合不同显示终端的实际应用,进行信息集成化传播、接收和交互的媒介系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各类媒介信息宣传、思想教育的制高点。^②综上,笔者认为“融媒介”教育体系建设的时代号角已经吹响,应从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平台三个方面加强大学生社会认同教育和引导。

第一,凝练内容,依托媒介热点开展重点主题教育。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空间成为社会交往的重要场域,媒介话语对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影响力日益增大,而各类文字、影音、视频、图像的即时传播,更使得以“90后”“95后”甚至“00后”为主体的大学生群体在传统课堂教育之外,受到更多来自媒介传播的“三观”认知、认同影响。因此,面对媒介的强大力量,我们必须重视并善于正面利用,依托媒介热点,适时开展各类重点主题教育,从教育内容、形式上着力创新,才能紧跟时代步伐,推进大学生社会认同的深入建构。媒介热点的形成,经常会汇聚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在大学生群体推进“污名化群体”模式的社会分类中,可以通过对“吃野味”“病毒”的关联反思,开展生态环境、饮食健康、动物伦理等主题教育,加强对大学生日常健康生活方式的引导。针对“武汉人”的污名化现象,也应重视大学生群体中对特殊人群的偏见和歧视,积极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认知,避免单纯以“污名化群体”来进行社会分类可能带来的群体性偏见和冲突。

第二,创新形式,鼓励大学生向自我教育“施教者”角色转变。大学生群体具有自主意识强、思维活跃的特点,传统课堂教育在应对重大突发疫情时相对滞后。为此,我们必须依

^① Kelmen H.C, Processes of Opinion Chang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61(25).

^② 《习近平谈媒体融合发展:关键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人民网, <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8/0822/c40606-30244361.html>, 访问日期:2022年7月31日。

托融媒介技术,通过网络计算机端、手机端等移动终端进行教育内容生产和交互。疫情暴发后,教育部发出“停课不停学”的号召,全国各地网络教育平台大兴,然而,倘若只是把传统课题教学内容搬到了网上传播,则依然很难实现大学生认同教育的高效化。为此,应该鼓励更多大学生直接参与到教育主导中来,促使其从“受教者”成为“分享者”“施教者”。比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鼓励大学生记录疫情动态中的所思所想,通过网络媒介技术赋权下进行分享和互动。作为以往“施教者”社会角色的老师,则成为幕后的“维护者”,在网络课堂上围绕疫情社会现象提问引导,采用主题发言、小组辩论、模拟法庭等多种形式,促使学生自我思考、自我教育,提升社会认同感。

第三,搭建平台,建立常态化教育和心理疏导机制。本文在调查中发现,面对重大突发疫情,大学生群体普遍存在一定的紧张、担忧和焦虑情绪。比如,在“疫情发生以来您在多大程度上体验到下列情绪”(第36题,10分制矩阵量表题)中,尽管“乐观”得分最高(平均值6.98),但“焦虑”(平均值5.56)、“愤怒”(平均值5.56)、“恐惧”(平均值4.8)、“悲伤”(平均值4.44)、“无助”(平均值3.35)等情绪体验依然相当高。这也表明,在对大学生开展社会认同教育时,不能忽视对其心理健康的关注和疏导。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对于病毒极具传播传染性的恐惧恐慌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情绪体验,而大学生群体由于人生经验相对较少,在政治、经济、社会等角色定位上不能独立,加之情感丰沛等因素,相当一部分大学生会遭受一定程度的心理创伤和心理疾患,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心理疏导和教育引导。为此,在日常思想教育和引导中,通过QQ、微信、微博、公众号等社交平台,建立日常化的心理排查和疏导机制,通过日常网络平台的“打卡签到”“心情日志”“秘密心声”等渠道,进行数据分析,聚焦共通心理隐患,开展针对性个体排查疏导。与此同时,定期举办心理健康主题教育,以网络影视、小说、自拍短视频、游戏等形式促进大学生人际交往,通过建立读书小组、影评小组、自拍小组、英文小组等各类学习和兴趣爱好的网络趣缘群体,增进大学生群体交流交往、团结协作,构建大学生“网络趣缘共同体”,促使大学生社会认同的深入深化。

统而论之,社会认同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是增强社会内聚力的必要条件。^①随着融媒介时代到来,媒介改变着人际关系和人与自身的关系,并对人的组合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公众对于疫情信息的获取主要依赖于各类网络媒介的主导性、选择性、意向性传播。由此,大学生群体基于对疫情的共同关注、情感分享、仪式互动,进入网络媒介话语权分割的博弈场,依托

① 李友梅:《重塑转型期的社会认同》,《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② [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3-34页。

网络议程设置开展社会认知,以“污名化群体”进行社会分类和比较,并通过自我积极区分确认社会认同建构,总体表现较为理智成熟。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发展使得人类社会进入了“风险社会”,面对“永远的不利条件”,个体开展社会认同必须将“社会”视为一种“变量”进行个体化的操纵,即“去学习将自身看作行动的中心和自己生涯、能力、取向和关系等的规划者”。^①对于大学生思想工作来说,就要不断提升其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培养其遇事冷静、客观公正、正确选择的能力。与此同时,要转变传统教育主客体视角,强化大学生群体社会认同的自我判断和独立思考能力教育,培养其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引导其在自我认同、社会认同的良性循环中不断成长、成熟。

On Social Identity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Major Epidemic Situation

——Analysis of Internet Big Data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New Coronary Pneumonia

ZHOU Ruichun JIN Cheng LU Qiyi CAO Junkang

[Abstract] Social identity is the self-affirmation of individuals belonging to their own groups and their roles in social practice, and is also the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ommunity and its sustainable and stable development, social Identity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system for college students. Taking the major outbreak of new coronary pneumonia as an example, through the online big data collation,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questionnaire and other forms of in-depth investiga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in the age of Internet Media,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ident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s influenced by the internet agenda-setting, so 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media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ll-media education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during the special period of major outbreak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hould also be fully used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interest based on interests and hobbies, to guide the college students to gather consensus, share common feelings and reliev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promoting the growth and maturity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healthy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Major Epidemic; College Student; Social Identity; Agenda-setting; All-media

(责任编辑:朱瑞)

^①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页。